

中华民族史观何以深入边疆

——云南边境地区共同体认同生成机制研究

董新朝

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保山

【摘要】中华民族史观的建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根基与认知基础。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中华民族史观理论内涵的阐发及其宣传教育路径的探讨，但针对该观念如何嵌入边疆社会并转化为个体共同体认同的问题，相关经验研究及作用机制的分析仍有待深化。基于对云南腾冲、瑞丽、镇康、河口等边境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本文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史观的传播绝非单一的历史知识输送过程，而实质上构成了共同历史记忆的创造与共同体认同建构的实践历程。在边疆社会的特定场域中，该观念的传播主要通过国家叙事、文化浸润、实践参与和数字传播四重机制协同推进，并呈现出“历史认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行动认同”的逐级递进演化轨迹。综上，本文提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史观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的内在机理。研究指出，边疆共同体建设不能单纯倚重制度层面的整合，历史认同维度的深层契合同样关键；而中华民族史观的传播与落地，已成为新时代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边疆治理；云南边境地区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BC24027）：中华民族史观在云南省边境地区宣传教育路径研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YB202555）：云南省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内生动力与外溢效应提升路径研究

【收稿日期】2026 年 6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7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40

How does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ake root in frontier regions? A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identity formation in Yunnan border areas

Xinchao Dong

School of Marxism, Baoshan University, Baoshan, Yunnan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ovides an indispensable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cognitive basis for foster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educational dissemination,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embedded in frontier society and transformed into community identity. Based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the border areas of Tengchong, Ruili, Zhenkang, and Hekou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and identity-building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its dissemination is not merely the transmiss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but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ivating community identity. Within the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of frontier regions, this process is jointly promoted through four interrelated mechanisms: state narrative, cultural immersion,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These mechanisms facilitate a progres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cognition to national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dentity, and ultimately action identity.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the HNICA Model of Frontier Community Identity Formation, which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作者简介：董新朝（1987-）男，云南保山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边境社会治理。

nation community.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frontier regions depends not only on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but also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historical identity. Therefore,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ave become an essential pathway for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of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Chinese natio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ational identity; Frontier governance; Yunnan border areas

1 问题提出

历史承载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亦是维系国民国家认同的根本依托。对于统一多民族大国而言，历史不只是过往史实的文字记录，更是连接往昔、当下与未来的精神纽带。秉持何种历史观，直接左右着民众理解族群发展脉络、厘清统一国家形成路径、把握民族共同体前进方向的思维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这一重要论断，将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置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突出位置，同时赋予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

中华民族大家庭，乃各民族历经千百年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缔造灿烂文明、共同孕育伟大民族精神，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聚合发展的历史逻辑^[2]。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历史观不仅是一套历史阐释框架，更是一套共同体认知体系，其核心价值在于构筑共享的集体历史记忆，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

边疆民族地区，是考察历史观念传播与民众认同生成过程的理想田野场域。从古至今，边疆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版图的关键构成，亦是中华民族逐步聚合演化的核心空间。云南省是我国民族成分最为多样、国境线最长、跨境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省份，国境线总长达到 4060 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山水相连。保山、德宏、临沧、红河等边境县市，既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前沿阵地，也是落地传播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实践场域。

回溯历史脉络，云南边疆始终是培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贯通，还是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地的经略治理；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西军民携手御敌的抗争史，还是当下兴边富民行动与边境幸福村建设，都充分印证了边疆发展与国家整体命运的密不可分。在长达数代人的持续互动中，云南边疆一步步深度融入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整体发展进程。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传播打破地域边界，各类信息快速流动。部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历史观借助网络平台传播，对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青年群体的历史认知和国家认同产生一定影响。一些地区还不同程度存在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表达不足、共同体叙事资源开发不充分以及数字传播能力相对薄弱等问题。这些现象表明，加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已经不仅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三大核心议题展开了丰富多元的学术探讨，积淀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从文献梳理的结果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呈现三个研究面向：其一是对中华民族史观核心要义、理论体系与时代价值的系统性阐发；二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机理、发展逻辑与培育路径的深入探讨；三是对边疆治理现代化实践路径、治理模式以及边疆民众国家认同建构问题的重点剖析。这些既有成果为学界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脉络、明确实践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从研究深度与视角来看，相关议题仍存在着明显的留白与深化空间。一方面，当前学界多集中于界定和解读中华民族史观的理论内核，聚焦于“本质属性为何”的静态理论阐释，而对于该史观在基层社会、尤其是在边疆地区如何落地传播、其实践路径为何，关注相对不足。另一方面，现有研究普遍承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重点在于论证其“为何重要”，却对该意识从认知到认同、从理念到自觉的动态生成过程缺乏系统性拆解。再一方面，边疆治理领域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建构、政策落地、基层治理等显性实践层面，对于共同历史认知这一隐性精神要素如何赋能边疆民众共同体认同建构、二者之间的转化机理与联动逻辑，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学理解释。

基于此，本文以云南边境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考察中华民族

史观进入边疆社会的现实场域、传播机制及认同效应，尝试回答“中华民族史观何以深入边疆”这一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揭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的内在逻辑，以期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反思

围绕中华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边疆治理等议题，学界近年来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史观逐渐成为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然而，从现有成果来看，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理论阐释和宣传教育路径探讨，对于中华民族史观如何进入边疆社会并转化为共同体认同仍缺乏系统解释。因此，有必要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本文的研究定位和理论贡献。

2.1 中华民族史观研究：从历史解释到共同体建构

中华民族史观研究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展开。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多个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实体^[3]。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奠定了重要学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史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王延中认为，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其核心在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4]。赵天晓、彭丰文指出，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保障^[5]。王文光、胡明、马宜果则从“四个共同”视角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强调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整体性和连续性^[6]。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已经较好回答了中华民族史观“是什么”的问题，即中华民族史观的理论内涵、历史逻辑和时代价值。然而，关于中华民族史观如何通过传播实践进入社会成员认知结构，并进一步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仍相对薄弱。换言之，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中华民族史观的“内容建构”，而对其“认同生成功能”关注不足。

2.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从政治整合到认同生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是当前民族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方向与核心命题。梳理既有研究的演进脉络不难发现，相关研究在早期阶段多围绕国家认同建构与民族团结实践展开讨论；伴随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上升为该领域的核心研究主线。严庆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三者的有机统一^[7]；郝时远从建设本质出发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搭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与共同价值体系^[8]；青觉则进一步强调，需立足历史脉络、文化根基与现实基础三重维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9]。

近年来，学界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逐步形成了三类主流解释范式。其一为政治整合范式，该视角侧重从国家制度建设、民族政策落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阐释其对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支撑作用；其二为文化认同范式，该路径将中华文化认同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与巩固的核心文化根基；其三为社会交往范式，强调各民族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重要社会土壤。

既有研究为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提供了多元分析视角与理论支撑，但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研究局限：一方面，现有成果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的逻辑推演与理论阐释，对微观生成机理的探讨有待深化；另一方面，针对共同历史认知向共同体认同转化的内在路径，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系统性关注。本质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既依托于现实层面的族际互动与交往实践，更植根于各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积淀。中华民族史观的传播与普及，正是连接共同历史认知与共同体认同的关键纽带，而这一核心中介环节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与学理论证。

2.3 边疆治理研究：从空间治理到认同治理

边疆治理是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路径的重要分析维度。周平提出，边疆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组成板块，也是推进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实践场域^[10]。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无法仅依靠行政管理与制度约束实现，更需要建立在边疆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之上。

近年来，边疆治理领域的研究重心逐步发生迁移，由传统的安全治理与空间管控议题，延伸至认同治理层面的深度探讨。学界普遍形成共识：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推进，既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更要将增强边疆各族群众

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作为核心目标。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之下，边疆治理研究愈发重视意识形态引领、文化认同建构与共有精神家园培育等相关议题。

然而，从现有成果来看，边疆治理研究主要关注制度治理、社会治理和文化治理，对共同历史认知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探讨不足。事实上，边疆治理不仅是现实社会治理过程，也是历史记忆重构过程。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2.4 理论反思：从历史认知到共同体认同的解释缺位

综合现有研究，中华民族史观研究主要以历史解释问题为侧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主要以认同建构为侧重；边疆治理研究主要以国家整合为侧重。三者分别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形成；边疆社会如何治理。然而，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仍然缺失，共同历史认知如何转化为共同体认同？换言之，中华民族史观作为共同历史记忆体系，究竟通过何种机制进入边疆社会？又如何实现从历史认知向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共同体认同的转化？现有研究对此尚缺乏系统解释。

从边疆社会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已经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其功能不仅在于传递历史知识，更在于塑造共同体意识。因此，仅从宣传教育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史观传播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边疆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重新审视。

基于此，本文提出“历史认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行动认同”的分析框架，尝试揭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以期弥补现有研究在认同生成机制解释方面的不足。

3 中华民族史观进入边疆社会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史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科学阐释，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价值逻辑。从边疆社会实践来看，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并非简单的历史知识教育，而是一个涉及历史认知建构、国家认同生成和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复杂过程。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国家认同理论和边疆治理理论出发，构建解释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与共同体认同生成关系的

分析框架。

3.1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社会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孤立个体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整体过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中华民族并非单一民族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这一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

对于云南边疆地区而言，无论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辟，还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滇西军民共同抗战，还是新时代边境幸福村建设，都体现出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因此，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帮助边疆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为共同体认同生成提供了历史解释框架。

3.2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价值导向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回答的是“中华民族如何形成”的问题，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回答的是“中华民族为何能够成为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多个民族共同构成的民族实体^[2]。这一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总体规律。

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与共”和“四个共同”等重要论断，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精神和共同命运。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实际上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实践方式。因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共同历史认知基础之上。

换言之，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前提是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历史记忆形成的基础是正确中华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则是共同历史记忆生产的重要途径。因

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构成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价值导向。

3.3 国家认同理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认同逻辑

国家认同理论为解析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向共同体认同转化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与解释路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3]。这种共同体想象并非自发形成的原生存在,而是依托共享的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与集体记忆持续建构而成。Anthony Smith 沿此理论脉络进一步指出,民族认同的核心植根于群体共享的历史叙事、集体记忆与价值体系之中^[14]。置于国家认同的分析框架下审视,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关键功能,在于通过搭建整体性的共同历史记忆体系,深化边疆民众对国家历史演进脉络的整体认知,进而推动国家共同体认同的生成与巩固。

从调查获取的经验材料来看,云南边境地区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并非悬浮的抽象概念,而是在边疆开发史、疆域守护史与国家建设史的叙事浸润下逐步建构起来的。猴桥镇“共和国一号界碑”、腾冲滇西抗战遗址、镇康南伞边防文化遗存、河口滇越铁路旧址等历史场域,事实上都承担着国家认同的具象化教化与身份塑造功能。据此而言,国家认同理论能够清晰阐释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从历史认知层面面向国家认同层面转化的内在逻辑。

3.4 边疆治理理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现实场域

边疆治理理论认为,边疆的长治久安不能仅依赖制度层面的刚性管控,更离不开认同层面的柔性支撑。周平指出,边疆治理的核心指向是实现国家整合^[15],这种整合既涉及政治、制度维度的结构化整合,也包含文化与认同维度的深层融合。进入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实践重心已从传统的疆域管控模式,逐步转向共同体建构的治理导向。特别是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兴边富民行动等系列政策的持续推进下,边疆治理中的共同体意识培育维度愈发受到重视。

在这一治理转型背景下,中华民族史观的传播已深度内嵌于边疆治理的实践体系,其功能并不止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播,更承载着塑造国家认同、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培育共同体意识的多重治理效能。也正因如此,边疆治理理论为把握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实践载体与运行空间,提供了现实维度的理论支撑。

4 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边疆社会场域

任何历史观的生成与传播,都无法脱离具体的社

会空间独立存续。中华民族史观之所以能在边疆地区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关键在于其传播过程深度嵌入了边疆社会的现实场域结构。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史观的传播并非仅通过课堂教育、政策宣讲等单一渠道推进,而是嵌入国家边界、边疆治理、跨境社会互动与集体历史记忆等多重场域,在各类场域的协同作用下逐步落地。

2024 至 2026 年间,本课题组先后赴保山市腾冲市下辖的猴桥镇、滇滩镇、明光镇,德宏州瑞丽市、陇川县,临沧市镇康县、沧源县,以及红河州河口县开展系统性田野调研。调研发现,中华民族史观在边疆社会的传播主要依托四类典型场域展开,即国家边界场域、边疆治理场域、跨境社会场域与红色记忆场域;各类场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联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史观嵌入边疆社会的现实基础。

4.1 国家边界场域:界碑叙事与共同历史记忆建构

国家边界不仅是地理边界,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空间。在边疆民族地区,界碑、国门和边境线等国家符号具有超越地理意义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它们不仅标示国家疆域,更承担着国家历史教育和共同体认同建构的重要使命。

腾冲市猴桥镇胆扎村“共和国一号界碑”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国家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载体。调查发现,当地群众对于界碑的认知经历了从地理边界到国家象征再到共同体认同的转变过程。一位长期从事巡边工作的护边员在访谈中表示“年轻时觉得界碑只是边界,后来巡边时间长了,才明白界碑后面站着的是国家。”这一表述反映出边疆群众国家认同形成的重要逻辑。近年来,腾冲市依托“共和国一号界碑”“国门新村”等平台,持续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在国门现场教学中,讲解内容不再局限于边境管理知识,而是系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疆域、中缅边界形成历史和边疆守护史等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边界场域逐渐转化为共同历史记忆生产场域。边民在认识界碑过程中,不仅了解边界形成历史,也逐渐理解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边疆的历史事实。因此,国家边界场域成为中华民族史观进入边疆社会最直接的现实空间。

4.2 边疆治理场域: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中的国家叙事

如果说国家边界场域主要依托国家符号传播中华民族史观,那么边疆治理场域则主要依托国家实践传播中华民族史观。

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实践。云南省自2021年启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来,沿边374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调查发现,边境幸福村建设不仅改善了边民生产生活条件,也重塑了边民对于国家与边疆关系的认知。腾冲市滇滩镇联族村、棋盘石村等抵边村寨近年来建设民族团结广场、边疆历史文化长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基地,将中华民族史观教育融入乡村建设全过程。一位基层干部谈到“群众以前觉得边疆发展靠自己,现在越来越认识到边疆发展离不开国家支持。”这种认知变化实际上体现出国家叙事通过发展实践不断嵌入边疆社会。国家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通过道路建设、教育医疗、产业发展等具体实践进入边民日常生活。因此,边疆治理场域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现实载体。

4.3 跨境社会场域:跨境流动中的国家认同重构

云南边境地区广泛分布跨境民族。傣族、景颇族、佤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在边界两侧均有分布。跨境民族长期保持经济往来、婚姻联系和文化交流,形成特殊跨境社会网络。从理论上讲,跨境联系可能弱化国家边界影响。然而调查发现,新时代跨境社会场域反而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空间。

瑞丽姐告是典型代表。作为我国唯一实行“境内关外”特殊监管模式的区域,姐告长期承担边境贸易和跨境交流功能。课题组调查发现,近年来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的治理实践,对边民国家认同产生明显影响。一位从事边贸经营的傣族商户表示“疫情期间国家保护我们,大家更能感受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案例说明,跨境社会并未削弱国家认同,反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强化了国家认同。同时,当地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建设以及边境文化活动开展,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历史教育。因此,跨境社会场域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新空间。

4.4 红色记忆场域:共同奋斗历史的情感生产

共同体认同不仅建立在历史认知基础上,也建立在共同情感基础上。红色资源恰恰是共同情感生产的重要媒介。云南边疆地区保存着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

腾冲滇西抗战遗址、松山战役遗址、国殇墓园、河口滇越铁路遗址等历史场所,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抗争和共同奋斗的重要记忆。

河口县调查发现,当地学校和社会组织广泛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通过讲述滇越铁路建设史、抗日战争时

期边疆军民共同抗敌历史,逐步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叙事。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红色资源成为连接国家历史与个人成长的重要桥梁。调查数据显示,参与红色研学活动的学生群体,其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显著高于未参与群体。因此,红色记忆场域不仅传播历史知识,更生产共同情感。它使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由理性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

综合调查情况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史观进入边疆社会并非单一路径,而是多重场域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边界场域生产共同历史记忆;边疆治理场域强化国家认同体验;跨境社会场域推动国家认同重构;红色记忆场域深化共同情感认同。这些场域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场域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传播网络。因此,中华民族史观之所以能够深入边疆,并逐步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原因在于其成功嵌入边疆社会现实结构之中,并通过多重社会场域持续发挥认同塑造功能。

5 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认同生成逻辑

前文分析表明,中华民族史观能够进入边疆社会,并不是因为其具有单纯的历史知识属性,而是因为其嵌入边疆社会多重场域之中,并通过持续传播实现认知塑造与价值建构。然而,仅仅说明中华民族史观进入边疆社会仍然不足以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形成。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为何能够转化为共同体认同?

从田野调查情况看,边疆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非瞬间形成,而是经历了历史认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和行动认同逐步递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叙事、文化浸润、实践参与和数字传播四种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中华民族史观由知识体系转化为价值体系,并最终形成共同体意识。

5.1 国家叙事机制:共同历史认知的生成

历史认知是共同体认同形成的前提。安德森认为,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被共同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共同历史记忆的塑造^[6]。从边疆社会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史观传播首先表现为国家叙事进入边疆社会的过程。

调查能够证实,无论是腾冲“共和国一号界碑”的实景教学,还是河口围绕滇越铁路开展的历史宣教,或是各地民族团结教育阵地的建设实践,均遵循着相近的叙事逻辑:系统梳理各族群众携手开发边疆、捍卫国

家主权、共御外侮的史实，逐步帮助边疆民众建立起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历史认知。

以腾冲猴桥国门教育基地为例，现场讲解内容不仅梳理国界划定的历史沿革，更重点还原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边疆、各族群众携手戍守国土的史实。这套叙事模式有效打破了地方史与国家整体历史之间的割裂状态，促使边疆民众逐步意识到，边疆从来都不是国家发展的边缘地带，而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此而言，国家叙事机制的核心任务，在于构筑共享历史记忆，妥善回答“中华民族从何处走来”这一本源性问题。

5.2 文化浸润机制：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

单纯的历史认知并不会自发升华为共同体意识，身份认同的巩固，还需要深厚的文化认同作为坚实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17]这一重要论断，准确点明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赖以存续的文化根基。

结合云南边境一线的调研材料来看，各地在传播中华民族史观的过程中，愈发重视润物无声的文化熏陶。近几年，腾冲、瑞丽、沧源、河口等边境县市陆续推出民族团结文化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宣教等系列活动。这类文化活动不再片面凸显族群文化的差异性，转而深挖各民族文化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沧源司岗里文化节即为此类实践的典型案例，活动既展示佤族本土民俗文化，又通过专题展览梳理佤族文化与中华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

一位基层干部在访谈中谈到：“过去大家更看重自身的民族身份，如今越来越看重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身份。”这一转变足以说明，共同体层面的文化认同，正在逐步超越狭隘的地域与族群认同。由此可见，文化浸润机制承担着转化功能，将浅层的历史认知凝练为稳定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回应“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身份命题。

5.3 实践参与机制：共同体意识的深化

如果说国家叙事和文化浸润主要作用于认知层面，那么实践参与则作用于行为层面。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形成不仅依赖观念认知，更依赖实践体验。在边疆地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其高度实践化。近年来广泛开展的边民巡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兴边富民行动均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实践载体。调查发现，边民在参与巡边护边过程中，对国家认同和共同体认同的感受最

为强烈。腾冲猴桥一位护边员谈到“巡边时间长了，觉得自己守的不只是边境，而是整个国家。”这一认知变化表明，共同体意识已经超越历史认知层面，转化为现实责任意识。同样，在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群众通过参与道路建设、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也逐渐形成共同建设边疆、共同维护边疆稳定的价值观念。因此，实践参与机制的核心作用在于推动共同体意识由思想认同向行动认同转化。它回答的是“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5.4 数字传播机制：共同体想象的空间拓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数字传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边疆地区，数字传播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形成新的共同体建构空间。

调查发现，当前边疆青少年获取民族历史知识的渠道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短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融媒体中心平台和数字展馆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载体。例如腾冲推出“国门故事”系列短视频；瑞丽推出“边疆青年说”栏目；

河口建设数字化边疆历史教育馆均取得较好传播效果。数字传播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将国家叙事、边疆故事和个人经验连接起来。通过网络空间，边疆群众不仅了解本地区历史，也能够了解全国各地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从而形成更广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想象。因此，数字传播机制实现了共同体空间的扩展。它回答的是“我与共同体如何联系”的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并非单向度教育活动，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认同生成过程。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不仅传播历史知识，更生产共同历史记忆；不仅塑造共同历史记忆，更生成共同体意识；不仅生成共同体意识，更推动共同体行动。因此，中华民族史观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共同体认同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边疆群众逐渐完成从历史理解者到共同体成员、再到共同体建设者的身份转换。

6 历史认同何以转化为共同体认同

前文分析表明，中华民族史观传播通过国家叙事、文化浸润、实践参与和数字传播等机制持续作用于边疆社会，并逐步推动边疆群众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然而，仅仅揭示传播机制仍不足以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历史认知为何能够转化为共同体认同？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现实效果，也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内在逻辑。现有研究虽然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等角度对共同体意识形成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对于共同历史认知

在共同体意识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基于云南边境地区田野调查资料,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之所以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其构建了从历史认知到行动认同的完整认同链条。为此,本文提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以解释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的内在机制。

6.1 理论反思: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解释缺口

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回答了中华民族为何能够形成的问题。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回答了共同体如何被想象的问题。周平的边疆治理理论则回答了边疆稳定如何实现的问题。然而,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时仍存在一个共同缺口,即缺乏对“共同历史认知如何转化为共同体认同”的系统解释。事实上,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还是边疆治理现代化,其最终目标都在于实现认同整合。而认同整合的前提是共同历史认知。换言之,共同体意识形成并非直接发生,而是建立在共同历史认知不断积累和深化基础之上。云南边境地区的实践恰恰提供了观察这一过程的重要窗口。

6.2 历史认知:共同体认同生成的逻辑起点

历史认知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变量。从调查情况看,边疆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并非首先来源于制度教育,而往往来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理解。例如在猴桥“共和国一号界碑”教育活动中,边民首先接触的是边疆开发史、边疆守护史和国家疆域形成史。他们通过了解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疆域、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逐渐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认知。这种认知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超越了地方历史,二是它超越了单一民族历史。边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家乡历史不仅属于地方历史,也属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因此,历史认知构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逻辑起点。没有共同历史认知,就难以形成稳定共同体认同。

6.3 国家认同:共同体认同生成的关键中介

历史认知形成后,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共同体意识。其间还需要国家认同这一关键中介。调查发现,边疆群众往往首先通过国家建设实践理解国家意义。例如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兴边富民行动;边疆基础设施改善;教育医疗服务提升都使边民切身感受到国家与个人生活之间的联系。一位滇滩镇边民在访谈中谈到“以前觉得国家很远,现在觉得国家就在身边。”这种认知变化表明国家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现实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共同历史认知向共同体认同转化的重要桥梁。

6.4 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生成的核心环节

国家认同形成后,还需要进一步上升为中华民族认同。这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键环节。在边疆民族地区,个体通常同时拥有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这些认同并非彼此冲突,而是呈现嵌套关系。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将地方民族历史纳入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将地方民族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将地方民族发展纳入国家发展进程。例如佤族群众在认识本民族文化历史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佤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佤族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知推动身份认同不断提升。即我是佤族,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一员,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华民族认同逐渐形成。

6.5 共同体意识:认同整合的结果

中华民族认同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一般身份认同不同,共同体意识不仅意味着认同中华民族身份,更意味着认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调查发现,边疆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护边员和青年学生普遍表现出较强共同体意识。他们不仅认同中华民族共同历史,也认同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这种认同已经超越单一民族利益范畴。而是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因此,共同体意识实际上是认同整合的重要结果。

6.6 行动认同:共同体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

认同最终需要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如果认同停留在思想层面,其稳定性和持续性都将受到限制。云南边境地区调查表明共同体意识最成熟的表现形式并非语言表达,而是行动认同。典型表现包括巡边护边;疫情防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边境幸福村建设;乡村振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等。特别是在猴桥镇、滇滩镇等边境地区,许多边民长期参与巡边护边工作。他们将守护边疆视为守护国家、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重要责任。因此,行动认同不仅是共同体意识的外在表现,也是共同体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即 History (历史认知)、Nation (国家认同)、Identity (中华民族认同)、Community (共同体意识)、Action (行动认同)。这一模型揭示了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的基本逻辑。其核心观点在于历史认知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起点;

国家认同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桥梁；中华民族认同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核心；共同体意识是认同整合结果；行动认同则是共同体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

7 结论

中华民族史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历史基础和认知前提。本文以云南边境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腾冲、瑞丽、镇康、河口等地田野调查资料，重点考察中华民族史观进入边疆社会的现实场域、传播机制及认同效应，并尝试回答“中华民族史观何以深入边疆”这一理论问题。

研究发现：第一，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并非单纯历史知识传播，而是共同历史记忆生产过程。云南边境地区的实践表明，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主要依托国家边界场域、边疆治理场域、跨境社会场域和红色记忆场域展开，并通过国家叙事不断构建共同历史记忆。第二，中华民族史观传播本质上是共同体认同生成过程。调查表明，边疆群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非直接形成，而是经历了历史认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和行动认同逐步递进的发展过程。第三，中华民族史观传播遵循“历史认知—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共同体认同—行动认同”的认同生成逻辑。基于此，本文提出“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揭示中华民族史观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制。第四，边疆治理现代化不仅依赖制度整合，更依赖历史认同整合。云南边境地区经验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层基础在于共同历史记忆建构。只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历史的认知，才能持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

总体而言，本文将中华民族史观传播研究从“宣传教育研究”推进到“共同体认同生成研究”，构建了“HNICA 边疆共同体认同生成模型”，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同时，云南边境地区经验也表明，中华民族史观传播已经成为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实现机制。未来研究仍需进一步关注不同边疆区域共同体认同生成机制的差异性，并加强数字时代中华民族史观传播与共同体建构关系研究，从而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和边疆治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R].新华网, 2021-08-28.
- [2] 习近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R].新华社,2019-09-27.
-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J].中国民族,2019(04):80.
- [4]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历史研究,2022(03):22-32.
- [5] 赵天晓,彭丰文.新时代党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及其重大意义[J].民族研究,2022(02):36-47.
- [6] 王文光,胡明,马宜果.中华民族历史观与“四个共同”研究论纲[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3):17-23.
- [7] 严庆,平维彬.“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05):14-18.
- [8] 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6):1-10.
- [9] 青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J].前线,2022(08):47-51.
- [10] 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11-17.
- [1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
- [12]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p. 14.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46.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